

商業領袖的使命(The Vocation of the Business Leader)

-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2012

17. 在影響地方企業或全球企業的眾多複雜因素中，有四個值得一提，它們在過去二十五年徹底改變了營商的環境。頭三個因素彼此關係密切：（1）全球化、（2）嶄新的通訊科技，以及（3）經濟金融化。第（4）個因素是文化轉變，其中個人主義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道德體系，為基督徒商業領導人危害最大。當然，還有影響現今商業的其他因素（國家規管、國際組織的角色、工會、環保問題、工作與家庭之間緊張的關係等等）。雖然這一切因素都值得研究分析，但為求言簡意賅，我們只會探討上述四個因素。

18. **全球化**：全球化經濟秩序的出現，是我們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全球化」一詞，指資源投入（尤其是勞動力與資金）與產品在全球的流動量激增，繼而帶動日增的社會聯繫網。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新興市場的開放，世界各地的企業市場迅速擴展。這既創造新機遇，也形成新威脅。之前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國家，如今都能參與其中而得益。高效率的運作創造更多產品和服務，使更多人負擔得起。與此同時，全球產量雖增長，但在收入和財富分布方面，無論在國內抑或在國與國之間，都出現了更大的不公平。在多個區域經濟區內，貨物自由流通以及使用同一貨幣政策，都有利於貿易，並刺激創新。可惜，工人往往未能獲享相稱的流動自由去尋找就業機會，尤其是使用同一貨幣的地區，當國家或地方政府為處理地區性危機而試圖推行有效的經濟政策時，同一貨幣政策所導致的限制，就有可能使整個政治體系陷於困境。同時，市場所及之地域，也從文化相近變成文化多元。這現象的好處是促使不同文化更深入地互相交流。然而，若果競爭激烈，標準化產品主導了全球市場，致使多樣性式微，那麼，文化霸權（cultural imperialism）之弊便會顯而易見。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總結這些不同的發展趨勢時說：「社會不斷全球化，雖然使我們成為鄰人，但沒有使我們成為兄弟」。

19. 這一切變化的背後，是「資本取得了新的自由」這個根本的現實。企業在某些國家賺取利潤，卻不再需要向當地人民承擔責任。經濟力量等於取得了治外法權地位。企業可爭取獲利的機會，卻獨立於國家權力當局；如此一來，企業不僅在經濟結構內，也在社會結構內發揮關鍵作用。因此，全球化改變了經濟及政體的基礎，也削弱了個別國家的自由度：在過往固定的領土範圍與國家的政經體系息息相關，全球化使得跨國企業可以在一個國家生產物品，在另一個國家交稅，並且在第三個國家申領援助。在這新的形勢下，企業對造福或破壞社會的左右力便更大。

20. **通訊科技**：互聯網所帶來的通訊科技革命，對商業管理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從積極方面來說，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合作方式，可為古老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並有助研發新產品，這都大大減低人們從世界各地聯絡的成本。新的商業模式以獨特方式把合作與競爭結合在一起，去應對過去難以滿足或根本無法滿足的需要。通訊科技也使消費／持分的團體向環球企業施壓的能力提高，更易於揭發業者的不良行徑，諸如在較貧窮地區，他們在人權以至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做法。這些行動都會使向來力求負責任的企業知所行，避免受懲罰。

21. 從消極方面來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講求即時滿足而且信息過量的世界。誠如一般人都發覺，在這樣的世界，急事取代要事。突來的溝通需要我們即時注意，收到的每一個訊息都成了優先處理的事。我們好像沒有時間對複雜的問題作深思熟慮的決定。就算是作出重要決定，也漸見思考不周，而彼此交流的信息也太少。商業領導人在準備作出決定和解釋為何要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就更困難，只好依賴個人經驗。在此情況下，他們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在制定決策時更形關鍵。

22. **經濟金融化**：全球化、擴張的市場與收益，以及新通訊科技的結合，就突顯了金融在商業中的地位。「金融化」一詞指資本經濟的重心由生產轉向金融，而金融界的收入和利潤，也在環球經濟中所佔的分量越來越大。金融界的機構、工具和動機，正大大影響商業運作和人們對商業的理解。儘管近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導致人們猛烈批評金融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金融界亦帶來

正面影響，比如，讓更多人更容易取得信貸，用來生產和消費；藉衍生工具分散風險；開闢融資渠道以增加生產等。金融界亦設立具社會或道德責任的基金，讓投資者選擇支持或迴避某些行業／公司，以鞏固可持續的商業系統。金融界日形重要、發展迅速，在金融危機期間取得若干可觀成果之後，更加得以進一步增長。《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指出這類投資的準則：「我們必須努力——這點極其重要——不僅在經濟體系或金融界中建構「道德」的部分，還有確保整個經濟體系——整個金融界——都合乎道德標準，不僅僅外在標示著道德，還要滿全其本質上的固有要求」。

23. 金融化雖有上述積極的發展，但本身也導致各種不良趨勢和後果。本文只探討其中兩個：商品化和短期利益主義。金融化傾向把企業完全商品化，把企業的意義貶為價格。金融界尤其把商業的宗旨等同為股東取得最大財富，助長了商品化的趨勢。股東的利潤成了商業領導人衡量自己表現和價值的唯一標準。在當前的風氣下，「為股東賺取最大財富」依然是主流意識，也是不少商業學院教導的主要理論。與商品化一起出現的是短期利益心態；在此心態下，商業領導人就難免專注於短期成就的潛力，而低估過度冒進和策略失敗的風險。能夠在較短時期內獲取巨大財富的機會，就誘使不擇手段的產生。教宗本篤十六世就注意到這危險：「毫無疑問，企業最大危機之一，是它們幾乎只是向投資者交代，因而限制了自身的社會價值。……能夠堅定不移、對公司的長遠生命和成果負責的董事已經越來越稀有」。

24. **文化轉變**：如上文所述，國與國之間通過全球化、人與人之間通過科技，帶來嶄新的接觸方式，因而導致顯著的文化轉變。對身為基督徒的商業領導人來說，兩個相關的主要文化轉變是：西方世界轉向個人主義，以及家庭破裂更普遍。經濟甚至社會都興起了強烈的功利主義，整個社會漸趨追求「一切對己有利」，毫不考慮對他人的影響，因而為家庭生活帶來不良影響。人們把「價值」看作是相對的，所謂價值，就是以個人喜好和商業利益來衡量。工作成為每個人換取生活享樂的手段而已。權利也變得比責任更重要；人們不再考慮為公益而付出。這些心態驅使高層管理人員只謀分紅，僱員視一切利益為理所當然，而顧客則追求即時的滿足。

25. 幸好近年有了一些新興運動和計劃，旨在更認真地探討商界的道德與靈性生活。這些運動和計劃有「信仰與工作」小組、工作靈修坊、商業倫理培訓，以及社會責任項目等，這些都有助商業領導人在管理公司時，秉持聖保祿勸諭的精神：「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得前 5:21）。許多這樣的團體和運動都幫助商業領袖領悟到他們的角色是使命，並明白到他們的企業有責任為公益作出貢獻。

26. 毫無疑問，全球化、先進的通訊科技和金融化，都能有益於人類團體，即使適當地關注短線的金融表現也可以是好的，但它不宜成為決策的唯一考量。而且，上述一切趨勢必須接受《福音》所啟迪的社會倫理原則的指引，並紮根在優良的文化體制之中。沒有福音持續的薰陶，上述各種趨勢就有可能破壞「整全的發展」。因此，教會社會訓導和我們對天主愛的信仰，正正能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真確可信的論述，使商業領導人得以滿全基督徒的召喚。

50. 商業的三大目標

甲-尊重人性尊嚴(教會訓導原則)

乙-追求公共福祉(教會訓導原則)

丙-商業可落實的原則

1. 當產品真正優良，服務真正到位 (services which truly serve)，商業才算為大眾福祉作出貢獻。
2. 商業需與貧窮人保持團結共融，具體方法是尋找機會服務不幸者、弱勢社群和有需要的人。
3. 商業貢獻社區，是透過促進人工作的尊嚴。
4. 商業透過輔助原則，給予僱員機會，行使適當的權力，履行機構的使命。
5. 商業為資源管理樹立榜樣，無論是人力、資金或環境方面的資源。
6. 商業按公義為所有持份者（僱員、顧客、投資者、供應商以及社區）分配資源。